上篇

斯大林提纲

泰斗——
古希腊悲剧中合唱团的领班，
负责与演员直接联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斯大林别墅中的会见

良心——主要是一种记忆，它包含从道德上对所作行为的评价。但是，所作行为如果没有被保存在记忆中，那么，也就无从评价了。没有记忆便没有良心。

记忆构成了一个人的良心，形成了他凭良心对待前辈和家人，对待亲戚和朋友，特别是对待最值得信任的，可以拥有共同回忆的老朋友的态度。同样，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构成了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道德氛围。也许应该思考一下，道德是否可以依赖某种其他的东西而存在：无视历史，忘却过去犯下的错误和沉重的往事，全力以赴地面对未来，在自认为是合理的基础上建设未来，忘记过去，连同它那阴暗的一面和光明的一面？

这不仅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

——Д.利哈乔夫《记忆》

1988年1月19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东方朝霞》宣布，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将以契科巴瓦的名字命名。乍看起来，这好像只不过是地方性或部门性的一件事，因为在苏联百科词典中，有关契科巴瓦的描述仅有几行，援引如下："契科巴瓦·阿尔诺利德·斯捷潘诺维奇(1898－1985)，苏联语言学家，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科学院院士(1941)，研究领域——卡尔特韦耳语和普通语言学。"[1]但记忆力好的、上了年纪的读者会发问："契科巴瓦不是在50年代抨击'语言新学说'的那一位吗？好像是在《真理报》上，对，对，连斯大林当时都支持他。对吧？"

是的，但不全面。事实要复杂得多，悲惨得多，神秘得多。

在许多情况下，一个民族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不完整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总有些事情在其历史中成了无法知晓或者无法理解的东西。

然而，在费多尔·阿勃拉莫夫的长篇小说《十字路口》中，竟有两个与马克思主义及语言学相关的情节，这绝非偶然。我们选引其中一段作为开头。阿勃拉莫夫生动地描写道：旷野上，几个格鲁吉亚人围坐在篝火旁，喝酒聊天。领导的出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其中一人赶快扯起了一个"严肃"的话题：

"费利亚是一个生性好斗的庄稼人，很瘦弱，身材短小，一绺浅色的头发垂在一双无神的眼睛上，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甘为别人效力的人。但他既固执又很奴性，像人们说的，还是一个色鬼。他似乎感到了不快的沉默，把小绳套扔在一边，说道：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这是怎么回事？听说，我们这儿又挖出坏人啦？

"——什么坏人？

"——是什么院士。听说，好像是想把俄语语言给毁了。

“ —— 语言？——阿尔卡季·雅科夫列夫惊奇地问，——语言怎么毁？

“ —— 是的，是的。——伊戈纳季·巴耶夫急忙帮腔说，——我也听说了。据说，斯大林亲自给他们清洗脑子了，在《真理报》上。

“一位上了年纪的打更人叹了口气，说道：

——看看，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去年有一些什么世界主义者投靠了国外的资本家，而今年又是院士……我就不明白，在我们国家，人的眼睛都往哪儿瞅呢？怎么就认不清这些坏蛋呢？”[2]

这些别喀什的庄稼汉们，或假装、或真的对这些‘学者－坏人’表示着愤恨，但他们却不知道，‘伟大领袖’并不是一下子就决定了要给院士们洗脑子的。在此之前，他或者是没顾上，或者认为政治形势不够成熟，或者只是到了晚年才产生了还想成为语言学理论家的热情……当然，庄稼汉们也不知道，斯大林和各个时代的许多大人物一样，在润色自己的‘理论’文章时，同样离不开别人的语言和思想，离不开别人的手和大脑。当然，把脑袋砍掉最简单，但这些脑袋有时对他又是何等有用啊！阿勃拉莫夫笔下的别喀什庄稼汉们还有不知道的：1950 年 4 月 10 日，斯大林为获得语言学泰斗封号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看过契科巴瓦院士《关于语言发展阶段》的报告之后（尽管报告的标题是这样的，但内容要宽泛得多），斯大林在这一天（4 月 10 日）把这位学者从第比利斯召到了自己跟前，讨论了一些积攒起来的问题，并决定就这些问题在《真理报》上开展一场公开的群众性大讨论。

1985 年，在契科巴瓦去世前不久，在格鲁吉亚出版的《伊比利安－高加索语言学年鉴》第 12 卷上发表了他对那个遥远的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代的简短回忆。我在本书中将多次提到契科巴瓦的这些回忆文章(尽管回忆录作者的某些评价很可能带有其主观性)。

契科巴瓦：

“我的这份简短的报告（论马尔的语言发展阶段），早在1949年就已经写好了,当时正是马尔的‘语言新学说’统治苏联语言学界的顶峰时期。报告是应当时的共和国领导人、《格鲁吉亚语详解词典》(该词典共 8卷,第 1卷于1950年出版,第 8卷于 1964年完成)的编审恰尔克维阿尼·康季德·涅斯托罗维奇的建议而写的。

“……1950年 4月初，我接到了我们共和国领导机关的通知,要我近日内去莫斯科：‘在那里,您将与中央的书记们讨论语言学问题,请您作好准备。’

“就这样,4月 10日晚,我们一行五人(第一书记恰尔克维阿尼、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两位部长和我)来到了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别墅。

“我们仅仅讨论了语言问题 斯大林对《格鲁吉亚语详解词典》的一些意见(词典的第 1卷已出版),以及关于马尔‘新学说’的问题……

“当时决定开展一场大讨论,委派由我来写发动讨论的第一篇文章。‘您先写出来,我们看看,如果可行,就印刷出版。这是您的报告,现在还给您。’斯大林说着,把装有《关于语言发展阶段》报告的文件夹放在了桌子上。但他马上又补充说：‘算了,还是先放在我这儿吧，看看现在您对这些问题能写出什么观点来，然后再把这份报告还给您。”[3]

契科巴瓦院士在听了斯大林的这段插话后的感受如何，现在只能是猜想,因为他在回忆中,既没有写他自己的想法,也没有写他的感受。当然，我可以在这里，在我叙述的这一部分中，

写出类似下列这样的话“:……要知道,契科巴瓦为了科学真理,已斗争了许多年了,而且是在我们常说的‘近乎于战争状态’的条件下,是在马尔主义者们极力清除科学异己的形势下,拉夫连季伊·巴甫洛维奇·贝利亚夹鼻眼镜上的玻璃镜片闪出的白光不能不让契科巴瓦院士心惊胆战……”但是,这种华丽的描述只适合文学作品,而不是纪实文献……无法对这种假设给予确认,也没有文献能证实,是契科巴瓦自己,而不是按恰尔克维阿尼的指示准备的报告,并坚持要把这份报告转递到斯大林手中。后来,他已经到了莫斯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一直待在“莫斯科”饭店里,不敢轻易离开,为的是等待斯大林召见……从文献中也无法证实另一种说法“:契科巴瓦院士曾得到过贝利亚的某些帮助(他也是米格列尔人)。”这种说法在非常有权威的杂志《历史问题》1988年的某一期中曾被引用过,但缺乏严肃认真的证据,并有一些事实错误。[4]在本书中,我尽力采用真实的事实和文献、公开发表的或文献收藏的见证和回忆。

因此,我想指出的是,亚历山大·依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小说《第一圈》中,对契科巴瓦的那些报告文章的历史及斯大林了解这些作品的经过,做了随意的、但却是独具匠心的描述。在这本书中,有一章叫作‘语言——生产的工具”,其中是这样描写斯大林和契科巴瓦的:

“……斯大林认为,他的同代人虽然把他称为天才中的天才,但仍没有对他的功绩作出恰如其分的颂扬。他们的喜悦只是表面的,他们并没有发现他的天才的全部深度。

“所以,最近(指1949年12月底——作者注)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要再创造一项科学功绩,除哲学和历史学外,再为其他某一科学做出自己不朽的贡献。当然,这样的功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生物学领域取得,但那里的工作他已委任给了李森

科——他是一个来自人民的诚实而精力充沛的人。数学和物理学也对斯大林有极大的诱惑力，他甚至不能够毫不嫉妒地阅读《自然辩证法》中有关‘求零’或‘代入方程的负一’的推论。但无论他把基谢廖夫编写的高等数学和索科罗夫编写的高年级物理学课本翻来覆去看了多少遍，却始终没能发现任何‘幸运的，突破。

“不久前，第比利斯的一位教授契科巴瓦的一件事，使他产生了令人庆幸的灵感：应该在另一个领域——在语言学中有所造就。契科巴瓦居然提出了显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邪说，称语言根本不是什么上层建筑，只不过是普通的语言而已，好像语言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只不过纯粹是一种民族语言。而且，他竟敢公开地玷污马尔的名字。

“因为马尔和契科巴瓦都是格鲁吉亚人，所以各种各样的评论相继出现在格鲁吉亚大学学报上。一本带有典型的格鲁吉亚连体字的、灰色的、简装格鲁吉亚大学学报现在就放在斯大林面前。一些马尔主义语言学者开始反击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开始罗列罪名，此后等待他的就是克格勃半夜的敲门声了。已经有暗示说契科巴瓦是美帝国主义特务。

“如果斯大林不说‘饶他不死’，那么，谁也救不了契科巴瓦。但是，这一次，领袖从口中取下烟斗，不紧不慢地说‘饶他不死’。他不仅饶恕了契科巴瓦，而且决定对他——这个非常普通的外省人的思想，给予永垂不朽的阐述和天才性的发展。”[5]

对于《第一圈》整部小说而言，这只是一个好奇而诱人的情节片段。索尔仁尼琴以此来表现斯大林作为‘理论家’的另一个侧面。但我们仍不应忘记，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纪实文献，而是一部生动的文学作品，其中有大量的创作意图上的因素……虽然，在索尔仁尼琴的分析和评价中，有很多地方都与历史学家们

的结论(但不是事件的事实方面)惊人地不谋而合。

然而,斯大林收到的契科巴瓦那份报告的历史,和契科巴瓦与马尔斗争的历史一样，早已是不止一年的事了。正如契科巴瓦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的那样，早在 1940 年,在苏联科学院语言与文学分部的全体会议上,他就作过《论帕乌利、索绪尔、弗斯列尔……马尔等关于语言实质（从苏联语言学的原则立场出发》》的报告。[6]在讨论这份报告的过程中，分部领导麦夏尼诺夫院士曾指出，语言与思维研究所的语言学家们在研究中已不再积极地采用马尔的一系列思想,契科巴瓦的报告将在《苏联科学院通讯 语言与文学分册》上刊出。然而,刊登出来的不是契科巴瓦院士的报告，而是麦夏尼诺夫院士自己的编辑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又一次竭力赞扬马尔学说和其“要素性古生物学语言理论”(请见第四章)。到了 1942 年,契科巴瓦提交的那份报告才全文刊登在第比利斯的《语言、历史和物质文明研究所通讯》上(题目为‘语言问题,语言学研究的对象’,10 卷,355 页～409 页)。

无论如何，4 月 10 日,在与斯大林会面时,契科巴瓦还是不能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怀疑和担忧。因为斯大林的行为和决定常常是不可预测的，这也正是最可怕的。况且，1950 年初,语言学界的形势非常非常严峻 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捉妖”运动仍在继续。然而,契科巴瓦本人在写到这一时期时,也尽量避免过多的感情色彩：

“1947 年(事实上是 1948 年—— 作者注),正是需要尽快消除战争造成的创伤的时候，在苏联科学院开展了一场生物学问题大讨论。生物科学的前途掌握在李森科院士手中，他是植物发育阶段论的发明者。据说,这一理论可以使‘土豆获得双倍的收成’,可以使‘一棵小麦结出好几个穗’等。从此,开始了李森

科院士及其阶段理论‘垄断’的沉重时代。”

1948年,在列宁格勒,在以马尔名字命名的语言与思维研究所召开了题为“生物学问题大讨论及其结果”的专题研讨会(有关内容见第七章——作者)如果植物发育阶段理论得到了正式赞许,那么,马尔的语言阶段性发展理论也应得到同样的礼遇。

1949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语言学战线的形势’;并通过决议‘马尔院士的‘新学说’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与其相悖的任何其他理论都应坚决予以肃清。是的,这并不是行政机关的决议,但这一决议出自于最具有权威性的国家科学机构,承认了马尔‘新学说’在苏联语言学界的垄断地位。

持不同意见者都被定了各种各样的致死的罪名: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基层组织已呈报了处理意见,有待上级组织的最后结论(例如,在亚美尼亚,从埃里温国立大学开除了著名语言学家戈拉奇亚·阿恰良院士和文学与语言分部的院士-秘书卡潘茨扬院士)(院士-秘书/АКАДЕМИК-СЕКРЕТАРЬ——科学院系统的一级职务,相当于分部主任——译者注)。

对苏联语言学来讲,1949年是非常沉重的一年。[7]

这确实是非常艰难的一年,整个局势实际上已发展到了足以使苏联语言学彻底崩溃的地步。确切地说,已经到了李森科及其信徒在生物学界制造的“安息日”的程度。而恰恰是在1949年,契科巴瓦决定将他的报告寄给斯大林。

契科巴瓦的题为‘关于苏联语言学的若干问题’的文章,于1950年5月9日发表在《真理报》上,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到6月底、7月初,《真理报》刊登了伟大领袖关于语言学问题的主要著作(还有一篇篇幅不大的文章发表于8月初)。斯大林在

第二篇文章(7月份发表的)的结尾中写道：

“苏联语言学中出现的停滞状态,是由于军警式统治制度和语言学理论上的混乱造成的。这种军警式统治制度是马尔的信徒们制造的，这种语言学理论上的混乱是马尔及其最亲近的同伙们造成的。要结束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必须消除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只有铲除这些病灶，才能使苏联语言学健康发展，才能使它走上宽阔的道路，才能为苏联语言学在世界语言学中占据领先地位提供可能。”[8]

然而“英明领袖和导师”的这些话只说对了一半。马尔主义者的军警式统治制度不会在一片空地上产生，它是由那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时代精神培育出来的，是靠汲取另一种更可怕的制度——斯大林制度的浆液滋长起来的。不过,为什么说是另一种制度呢？军警式统治制度实质上就是斯大林制度的一部分！

至于说“宽阔的道路”和“世界语言学的领先地位”,则应该说，在斯大林这个提法中漏掉了一个词——“再一次”(虽然,不能说俄罗斯和苏联语言学曾经是整个世界语言学科学的绝对领袖)。但确实应是“再一次”,因为在对革命前语言学科学经验进行创造性思考的基础上,苏联语言学工作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功绩都是非常伟大且意义深远的。苏联语言学发展的速度及其所达到的水平都已相当高。直到后来,语言学上空出现了可怕的阴云,许多语言学家被吊上了意识形态的拷问架，这一发展势头中断了。

而且,还不仅仅只是意识形态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注释：

[1]《苏联百科词典》,第 4版,莫斯科，1987年,第 1499页。

[2]阿勃拉莫夫 Ф:《十字路口》,列宁格勒，1981 年,第 14 页～15页。

[3]契科巴瓦 A:"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和怎样发生的",《伊比利亚－高加索语言学年鉴》,XII,第比利斯,1985 年,第 11 页。

[4]《历史问题》,1988年，№ 6,第 59 页。

[5]索尔仁尼琴 A. И:《第一圈》,巴黎,《世界基督教青年协会会刊》,1969年,第 118 页。

[6]同[3]第 10 页。

[7]同[3]第 10 页～11 页。

[8]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若干问题 答 E科拉舍宁尼科娃",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莫斯科,1950年,第 36 页。

第二章　新圣西里尔和圣梅索迪乌斯

学问的发端是对语言的掌握，但它好像长满荆棘的荒野，好像怪石林立的山峦。在这里，觅不见安营休整的快乐，旅行者的足迹也找不到可供歇脚的平地，在这里，没有疲倦者的绿色避难所。

——阿·拉季舍夫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公元 9 世纪，在斯拉夫的土地上出现了著名的索伦两兄弟，他们就是启蒙教育家和斯拉夫文字的创造者—— 圣西里尔(康斯坦丁）和圣梅索迪乌斯。他们的伟大功绩永远不会泯灭！我们，作为他们同代人的后裔,南斯拉夫和东斯拉夫民族的子孙,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在斯拉夫文字之父的纪念碑前俯首鞠躬。 5 月 24 日——是斯拉夫文字节。很久以前,这一天就被东正教教会定为圣西里尔和圣梅索迪乌斯纪念日。在保加利亚,这一天成了民族节日 ——文化教育节(这个国家的国家级奖励之一,就是由著名斯拉夫启蒙教育家的名字命名的—— 圣西里尔和圣梅索迪乌斯奖章)。在这一天,我们应体验到一种特殊的情感。十分遗憾的是,当我们享用索伦两兄弟经过许多世纪传给我们的这份最珍贵的赠品—— 字母文字时,却对圣西里尔和圣梅索迪乌斯的语言学研究工作了解甚少。事实上,可以了解这些的惟一的文献来源就是两兄弟的传记——《康斯坦丁(圣西里尔)传》和《圣梅索迪乌斯传》。《康斯坦丁(圣西里尔)传》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按着上帝的旨意,莫拉夫大公罗斯基斯拉夫与自己管辖之下的各个公爵及莫拉夫人民召开了会议,进行了商讨,然后,他派人到拜占庭帝王米哈伊尔那里说：‘让我们的人们放弃多神教,也来执行基督教的法典吧。在我们这里,没有传教士能用我们的语言给我们讲述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也无法让别的民族的人民看到我们所作的一切而来效仿我们。请帝王给我们派一个这样的主教和传教士吧。这一美好的法典正是从您这儿传遍全世界的。’’

拜占庭帝王把高级神职人员都召集在一起，并召来了哲学家康斯坦丁(圣西里尔),对他讲述了这件事情。帝王说“：哲学家,我知道,你现在很疲劳,但是,你最适合去那里,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只有你才行。’哲学家回答说“：我的身体

确实十分疲劳,而且还有病在身。但是,如果他们那里的语言有字母符号,我将很高兴到那里去。'帝王对他说:'我的祖辈、父辈和其他很多人都曾努力寻找过,都没有找到,我怎么能得到呢。"哲学家道:'那谁能把谈话记录在水上呀?谁愿意让人看成是邪教徒呀?'帝王又回答说:'如果你愿意去的话,那上帝会让你拥有文字的,就像上帝愿意赐福予所有真诚地请求他的人一样,给敲门的人打开大门。"

哲学家回去以后,就和他的助手们开始按照古老的习俗祈祷。很快,上帝听到了自己的臣民的祈祷,就给予了他们所祈求的一切。哲学家便创造出了文字,并开始书写圣经上的话:'世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等等。拜占庭帝王十分高兴,与大臣们一道颂扬上帝,并派遣哲学家带着许多赠品到罗斯基斯拉夫那里去,同时还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上帝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认识真理,获得更多的优点。当上帝看到了你的忠诚和努力,就在当今世界创造了创世纪以来不曾给予任何人的东西——赏赐予你们语言的字母文字,使你们也加入到伟大民族的行列,能用自己的语言赞美上帝。'[1]显然,《传记》把斯拉夫文字的创造描绘成是上帝赐给圣西里尔(康斯坦丁)的特殊馈赠。因此,可以说,《传记》是圣经作品的一种体裁。但我们都清楚、都知道,哲学家圣西里尔和他的兄弟曾进行了多么巨大的、艰苦细致的——实践方面的、甚至说是理论方面的工作(分析斯拉夫言语的发音,与他们知道的其他语言的字母对比),才使他和他的兄弟得以用斯拉夫自己的文字把斯拉夫人的话语记录下来,才有可能把最重要的圣经文章翻译过来,并为此培养学生,才有可能用人民都能懂得的语言来举行祈祷仪式。

在苏联语言学的历史中,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就它的特点,学者和研究人员在这一时期所解决的问题的意义和实际成

果而言，可以与圣西里尔和圣梅索迪乌斯的启蒙教育相比。当然,这一时期与宗教启蒙没有任何关系,但与十月革命后在我们国家进行的革命文化建设的教育这一重大任务有关。这样的教育要求苏联语言学者有时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在十月革命后的这一时期,为准备语言改革和实现语言建设,苏联语言学家付出了巨大的忘我劳动。对于这段历史,早已是妇孺皆知,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曾出版了几十本著作，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文章。[2]因此，恕不详述。在此仅想回顾那些最具代表性、最令人感兴趣的事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最迫切的现实是进行严肃认真和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的前提、直接原因和理由(例如,在语音学和音位学领域,没有这些理论就无法研究字母)。换句话说，革命化建设的需求促进了在语言学中的积极的科学探索……我们需要牢记些什么呢？

首先应记住，在对文化建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语言学家中,曾有不少是来自旧学派的学者,其中有许多人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心灵来迎接革命的。但是，新时期也为许多新一代专家开展创造性活动提供了条件。这是很自然的……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全新的、大量的革命性的任务：

必须使千百万人民认识字母文字,了解自己的母语,了解标准语。必须争取使俄语标准语成为大众化语言——首先是改革陈旧的书写规则,虽然许多学者在革命前曾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未能完成这个任务。

必须为居住在我们国家的几十个民族各创建一套字母表。此前,他们或者使用别的语言中的文字,或者根本没有文字(没有文字的民族)。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这是一件最重要的革命事业。如果认真地回顾一下过去,则可以说,如果不是在相当短的时期内,为我国的各族人民科学地制定出字母表,就不可能

使他们在文化和文学方面有如此重大的突破，就不可能在他们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如此大的飞跃(虽然我们知道,在这一过程中还曾有其另外的一方面)。

必须解决大量的其他问题——语言学问题、社会语言学问题、应用方面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从编写教科书、初级识字课本、各种手册到培养教师队伍,从研究话语文化问题(报刊新闻媒体和出版界的语言文化问题)到建立基础词典。1920年1月18日,列宁曾给卢纳恰尔斯基(汉语《词海》中译为卢那察尔斯基，时任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译者注)写了一封信,在这封著名的信中,列宁强调了编写《当代俄语词典》、《现代人和古典作家(从普希金到高尔基)用语词典》的重要性。[3]

可以列出几十名语言学家，他们都与这些任务的实施与完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阿瓦涅索夫、布勃利赫、维诺格拉多夫、维诺库尔、杜尔诺沃、日尔蒙斯基、日尔诺夫、拉林、里亚普诺夫、马尔、麦夏尼诺夫、奥勃诺尔斯基、奥仁果夫、彼捷尔松、别什科夫斯基、波利瓦诺夫、烈佛尔马茨基、谢里舍夫、西多罗夫、苏霍金、乌沙科夫、沙赫马托夫、谢尔巴、雅科夫列夫等。

看来,还应该专门谈一谈莫斯科语音学派的形成、发展及其作用(雅科夫列夫、列佛尔马茨基、阿瓦涅索夫等)。这一学派发展了俄语语言学(巴杜恩·德·库尔德奈、佛尔图纳托夫)的优良传统，确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正是在这一学派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才为那些在革命前没有文字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创建了字母表。

1960年，科学院院士维诺格拉多夫在《列宁与科学》文集中,发表了一篇题为'列宁与苏联语言学的发展'的文章,文中对文化革命的纲领中有关推广识字教育，在多民族国家发展语文科学的思想及其付诸实施等问题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